

辛亥革命秘辛

——趙爾豐玩火自焚

●王成聖

家世顯赫心狠手辣

辛亥革命前後，滿清地方大吏，看到清廷大勢已去，許多人作「明哲保身」的安排。革命黨人更沒有對他們作尋仇性的殘殺。惟有被人稱為趙屠戶的趙爾豐，愚昧的憑其心狠手辣的慣技，還想翻雲覆雨，從火中取栗，結果玩火自焚，被砍頭慘死。

趙爾豐，字季和，原籍江蘇海州，寄籍山東泰安，祖先在明末時投降滿清，編入漢軍旗下。家世相當顯赫，可稱得上世代簪纓。到了他這一代，兄弟都是才智之士。兩個兄長爾震、爾巽，和一個弟弟爾萃，都是進士，尤其二哥爾巽，官高望重，曾經擔任過四川總督、東三省總督；民國以後，還在袁世凱旗下做過清史館館長，是袁世凱的「嵩山四友」之一。

他本人，沒考中進士，乃以納賄出身（又叫捐班），雖說沒有學過武，但却以軍功起家。因為他曾經隨同升允剿辦拳民（義和團），在直隸廣昌抵抗過八國聯軍；在四川邊境藏人鬧事叛亂時，他又以「知兵」的經歷，奉令前往鎮壓。攻

克理塘，平定巴塘之亂，因功擢升為建昌（今四川西昌縣）道尹（相當於現在的行政督察專員），踏上為官騰達的階梯。他雖說平亂有功，但却心狠手辣，以多殺立威，難免傷到無辜。民衆對他這套殺人如麻的作風和逆我者死的心態，十分痛恨；都稱他為「趙屠戶」。

不久，他又因為鎮壓禍亂，安定地方之功，升任四川布政使。（亦稱藩臺，掌理全省的民政、財政）當時，四川總督（總督文武，相當於民初的督軍、都督，抗戰時期的省主席兼綏靖總司令）錫良去職，清廷發表他二哥趙爾巽自奉天（現在的遼寧）將軍的職位前來繼任總督。未到任前，由他護理。

光緒卅三（一九〇七）年，他以護理總督身份，在成都大規模搜捕革命黨人，逮捕到黃方、楊維、張治祥、黎清瀛、王炳章、江永成六人。依照他的一貫作風，下令將這些「亂黨」，砍頭示威。

幸虧當地的名士：伍崇生、老翰林、胡晴嵐、太史等人再三懇求，幾乎下跪涕泣陳情減免，才得以改為「永遠監禁」（這就是有名的丁未省城革命

六君子事件）。

除了「六君子」，還有一個四川內江人余培初，漏網在逃，到了山西，改名為公孫長子，賣字成名。趙屠戶雖然奏請朝廷，嚴加緝捕；也奈何余培初不得。

等到趙爾巽到任，按照清廷的官場慣例，親生弟兄，不能同時在同一地區擔任負責疆寄的大吏；於是趙爾豐就奉調為川滇邊務大臣，離開成都，到川邊打箭爐（康定）去了。

因為他的任務是鎮壓邊境，不但要有官位，同時也要有屬於自己的武力，好在總督是他二哥趙爾巽。於是，在趙爾巽的支持之下；他在打箭爐招兵買馬，編練十幾營巡防軍，穿着裝備，與一般軍隊不同。一律青布包頭，黃布軍服，灰布裹腿，麻耳草鞋；九子快槍，還有一把寒光閃閃的鬼頭蠻刀。對待老百姓，處處擺出「鎮壓」的姿態，一罵二打三動刀；非常凶悍。但巡防軍對趙屠戶却絕對服從，卑躬屈節，一片愚忠。因此，這一批巡防軍，就成為他此後活躍政壇的雄厚資本，同時，也正因為他有此憑藉，才導致後來的不甘心就範，而逆天悖時的慘遭非命。

四川爆發保路風潮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秋天，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，所遺四川總督一職，由布政使王人文護理。次年初，四川發生保路風潮。

先是滿清末葉，中國現代化風氣漸開，國內鐵路逐漸興築。光緒廿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，英美兩國向我外務部請求修築由成都到漢口的鐵路。光緒廿九年閏五月十四日，四川總督錫良，奏請自設「川漢鐵路公司」。大概分爲成渝、渝萬、萬宜三大段，總長約一千里。湖北境內的萬宜段部份，宜昌以西歸川省修築；也經川、鄂兩省總督奏准。

這一公司原係官辦，歷時三年，成效不彰；遂於光緒卅二年改歸商辦。正名爲「商辦川漢鐵路有限公司」，資本的籌措，仿照湖南抽穀之法，凡收穫在十石以上的，百分抽三，隨時填給收單，滿白銀五十兩，即爲一股，發給股票；訂定資本總額爲五千萬兩，先收一千五百萬兩。四川父老，聽說可以由自己出錢修路，將來還可以由自己經營管理；既可以便利交通，又可以富國裕民；甚至還可以抗拒列強的蠶食瓜分。都興高采烈，踴躍認股，除巨商大賈、有錢的人多多出資認股外；就是一般小商販，也甘心情願的湊錢買上一股半股。有些鄉村婦女，也將積麻紡織，養雞養鴨的錢湊湊合起來，購買股票。那時誰家有一兩張「川漢鐵路」的股票，就覺得很神氣，很光榮。那種熱愛國家的情緒，相當普遍，而且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於是，在成都岳府街成立總公司，在宜昌成立分公司；並且着手修築宜昌到萬縣的一段，完成一百多里的路基。可是，由於主其事的紳士們意見分歧，經驗不足；甚至有人居心作弊私。以致截至宣統三年四月底，所收股本一千四百餘萬兩，竟被倒賬三百萬兩；加上已支用四百餘萬兩；僅存七百餘萬兩。而通車之路，僅有卅餘里。

清廷的給事中石長信上疏論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弊害有謂：

「川漢集款，皆取自田間，其款確有一千餘萬，紳士樹黨，各懷意見，上年始由宜昌開工，至資州以東，此五百里工程，尚不及十分之二三，不知何年方能告竣。而施典章倒賬至數百萬兩之多」。

他建議：「宜敕部臣將全國幹路定爲國有，自餘支路，准各省紳商集股自修。奉旨交郵傳部議，也以爲：

「從前規劃未善，並無一定辦法，以致全國路政，錯亂紛歧，不分支幹，不量民力，一紙呈請，輒准商辦。乃數年以來，粵則收股及半，造路無多；川則倒帳甚巨，參追無着；湘鄂則開局多年，徒供坐耗……」

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，清廷乃下詔，定「鐵路幹線國有」政策。廿日，派端方爲督辦粵漢、川漢鐵路大臣。廿二日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、德、法、美四國訂約借款一千萬鎊，作築路之用，廿四日正式宣佈「川漢等鐵路改歸官辦」。

但對各路已經收得的民股，如何發還或折股；計算和方式上，都大有差異。最好的是湘路、鄂路，不但一律照令發還；就是動用的米捐租股，也准發給國家保利股票。其次是粵路，每股從優先發還六成，其餘發給國家無利股票。惟有川路，只有尚存的七百萬和宜昌已用去的四百萬兩，准發給保利股票；其餘的開辦費卅三萬兩，只發無利股票，被倒賬的三百餘萬兩，却不認賬。這種不公平的辦法，引出了問題。

除了清廷對川人的原有股款處理辦法不公平，使得川人有血本無歸的感受以外；還有，盛宣懷與外國人簽約，把鐵路的監督、管理、拓展、用人等權都讓予外人，也引起川人的激烈反對，以爲是喪權辱國，何所謂之「國有」？於是起而力爭。

首先，在北京擔任御史的四川人趙爾巽、盛宣懷借債賣路，成都方面，士紳代表鄧孝可也在「蜀報」上發表文章，主張：「只要政府握川漢鐵路四年來用去的款子，在上海的損失股本，一律用現金退還，四川人還是可以勉強同意鐵路國有的」。

繼而，「四川諮議局」及川漢鐵路股東集會通電反對。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及成都旗兵將軍裕昆，也電請清廷收回成命。不但未被採納，反而遭受斥責。五月廿一日，鐵路公司召開臨時大會，到會千餘人，羣情憤慨，痛哭流涕，決議：「川路爲光緒皇帝批准川人自辦，不能收爲國有；四國借款合同條件太苛，川人不能接受，懇求護院（王人文兼攝）速即電奏，收回成命」。

王人文對川人相當同情，上奏中曾說：

「路者，國家之土地，路不為我有，土地寧為國家所有？貸款四國，既索我九五扣五厘息，又限我十七年，又質我兩湖厚稅，然後借款。而終明目張膽，視我之路，為彼之路；奪我之權，為彼之權。……特自與四國貸款合同宣佈以來，不惟有識之士奔走呼號，羣若且暮不能自保；本月廿一日，成都各團體，集鐵路公司大會，到者二千餘人，討論合同，及於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係，一時哭聲震天。坐次在後者，多伏案私泣，臣飭巡警與派員鎮壓；巡兵聽者，亦相顧揮淚……」

儘管王人文的上奏如何懇切，但却再遭嚴斥，並且下令將他調回北京，命令在打箭爐的趙爾豐繼任四川總督，處理此事。

川人自五月廿一日後，即正式成立「成都保路同志會」，各縣也紛紛成立「同志會」。發表其奮鬥的中心思想為：「收路國有之命，川人尚可從；收路而為外國所有，川人決不能從。借債主辦內政，川人尚可從；借債而令外人奪我財政，川人決不能從……即郵傳部橫施壓力，強制川人，川人有死而已」。因此，此一「保路運動」的性質，已由「還本保路」而演變為「愛國救國」了。

調解不成準備決裂

趙爾豐接到調赴成都的旨意後，先派他的兒子老九，和已過繼給趙爾豐的兒子老四，前往成都，打聽消息。自己則緩慢前進，思考應付的方

策。他想：

「川邊的土司，比你四川的士紳，頑強威武；還被我殺的殺，趕的趕。卅九族，乖乖的輸誠納款，接受改土歸流？那些一向凶悍的老百姓，還不是寧可放棄老祖先的姓氏，接受我頒發的『百家姓』改名換姓嗎？川耗子，向來服硬不服軟。王人文沽名釣譽，對他們曲予優容，慣壞了他們。我趙爾豐可不是好說話的，我要以強硬的手段，上替朝廷分憂，下為百姓安命。」

他於六月一日到成都，九日接任四川總督。十一日，「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」開會，全川各州府縣代表六百多人，選出顏楷為會長，裴瀾為副會長，趙爾豐也率領成都官方各單位主管列席參加，他在會場發表演說，說明鐵路國有，可以減輕川人的負擔，對川人極有利益，所以不必搞「保路」。至於「廢約」，關係到國家外交的信譽，勢難辦到。

他的這套勸說之詞，當然不為與會者接受。於是，由裴瀾上臺演說，針鋒相對的駁斥他的論點。最後結論說：

「我們股東只知道道路當保，約當廢……大家一定要同心協力，斷不能附和賣國郵傳部和賣國賊盛宣懷來吃亡國的苦。」

在如上激烈的呼聲之下，整個會場的情緒為之沸騰，掌聲、跺腳聲、號哭聲，以及責罵盛宣懷的口號聲，交織在一起。趙爾豐氣得鐵青着臉，匆忙的敗興而返。

十三日再開會，趙爾豐就不出席了，只派勸業道（相當於現在的建設廳長）胡嗣秦、巡警道

（相當於現在的警務處長）徐樾前去參加。恰巧，大會收到端方自武漢發來的電文，指責「保路同志會」是非法組織，倡謀之人，應當嚴加拿辦。於是，大會變成漫罵端方的洩憤場，情緒激動之下，通過了一通回罵端方的電文，交由胡、徐二人送請趙爾豐代轉，就草草散會。

由於川人的「保路救國」的意願非常強烈，趙爾豐的智囊團向他建議：為表示他的豁達大度，不計較恩怨，不妨再次的試着與士紳和解。他自己也想到：今天的問題，舉的是「國有」與「商辦」；但事實是「尊旨」與「抗旨」。他以為還應當再向大家曉諭一下，如果仍然無效；再考慮來強硬的，於是，他又親自參加十四日的第三次大會。可是，事實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根本不讓他登臺發言，一片爭吵，漫罵聲中，通過了重慶派來的代表朱之洪（又名朱叔痴，革命黨員）的臨時動議，「質問郵傳部，懇請四川總督代奏，川漢鐵路仍歸商辦；並速提回宜昌、上海各處的鐵路款項。」

突然一股人潮，衝向主席臺，變成一道人牆，大家面紅耳赤，擺出找人拚命的架勢，向趙爾豐示威：「不答應就不讓他走」。他無可奈何，只好先應允代奏，才得脫困安返。

他一想，世道真是變了，「川耗子」居然變成「川蠻子」，從此，他以「拒絕代奏」不再參加「保路股東大會」，表明他與四川紳民公開決裂，暗中部署強硬措施，俟機待發。

武漢方面，端方對「川漢鐵路公司」駐宜昌的分公司經理李稷勳大施壓力。李稷勳未經總公

司通過，竟然私相授受的把宜昌分公司的帳目交給端方派人接收。總公司乃將李撤職。端方居然透過郵傳部，以欽命性質任李為宜昌鐵路公司總辦。六月廿三日，端方再會同兩湖總督瑞澂上奏，主張對川人的集會反對，應請明降諭旨，責成趙爾豐嚴厲對付，以遏亂萌而靖地方。

此一消息傳到成都，激起衆憤，都以為政府不講道理，已經以行動來實行搶奪了。另一方面，川路股東會代表劉聲元入京叩閣呈請，也被警廳押回四川；蕭湘到上海發動各報館，為川事聲援，途經漢口，也被瑞澂扣留。川人失望痛絕之餘，乃於七月一日起全川罷市，宣言從此不納糧稅雜捐，以此抵扣股息；並散發「川人自保」的「商榷書」，鼓動民衆起義。事情越鬧越大，而且越發的複雜了。

隔了兩天，羣衆在好多條街道搭起了「先皇臺」，供奉光緒帝神位，激勵民氣，抗拒「鐵路國有」。

為解決已罷市十天的社會不安不便；而恢復常態。有些紳士們出面呼籲雙方讓步，一再開會，協議請四川總督、將軍等重要官員聯名代表奏：「鐵路仍歸商辦」，並且立即恢復開市。但此一議案剛剛提出，即就遭到會場大多數人的反對：「路權沒有收回來，隨你說得蓮花出現；就是不開市。」「誰要老子開鋪門，誰就是盛宣懷、端方的走狗、奴才」。一片怒吼聲，彼此此應，眼看調解不成了。

接着，七月十二日，真的實施罷稅、罷捐了。事實發展到此地步，趙爾豐已經別無選擇；加

上朝廷採端方的奏請，有動武的決定。於是他開始實行他籌劃已久的強硬手段了。

誘捕紳士大肆殺戮

實行強硬手段，必需有足够的武力。但在成都的新軍第十七鎮（相當一個師）統制朱慶瀾間接向趙爾豐表示：「要新軍打土匪是可以的，但要他們去對付『同志會』，不一定會聽從指揮的」。趙爾豐只好連夜派人從川邊調來他一手訓練的巡防軍八個營，供他驅使。七月十四日以前，已經陸續到達成都。

七月十五日中午節，老百姓正忙着祭祖。一大早，趙爾豐說是北京來電，有好消息宣佈。派人請來諮議局議長蒲殿俊、副議長兼保路會會長羅綸、鐵路公司的彭蘭棻、股東大會會長顏楷、副會長張瀾、常在報章發表文字的鄧孝可，還有議員、股東、學界的江又乘、王銘新，同情保路而去了官的前電報局局長胡嶸等人，讓他們坐在大花廳內，但却無人接待，也遲遲不見動靜。

一個小時後，突然趙爾豐的衛隊長山東人張麻子出來大聲呼叫：

「大帥口諭，將這些圖謀不軌的首要分子，一齊綁了，立即斬首！」

接着跑出些巡防軍大漢，將蒲、羅等人細綁起來，拉出大廳，拴在樹上。每人身邊，站着一個已準備就緒的劊子手，手握明光透亮的大刀，等候行刑的口令。被綁的紳士們當然不服，有人嚴厲的提出抗議：「寫出罪狀來，拿出證據來。」

滿院子站的巡防軍，禁止任何人通行，只有那個隊長張麻子跑進跑出，高聲大叫：

「準備好啦，大帥把電話打完，就出來點標子啦！」

「快啦，大帥在會見各位大人，等端茶送客，就要動手啦！」

正在萬分緊張的時刻，忽然營務處（相當現在的參謀部）的田徵葵，兵備處（相當現在的保安處）王棧、趙爾豐的兒子老四、老九忙着跑了過來，老遠的就大叫「刀下留人」。於是又忙着替他們鬆了綁，還給他們衣帽，穿戴整齊後，請他們到「五福堂」開會。

他這套先綁後釋的把戲，一方面是向紳士們示威，同時也因為駐防成都的滿洲將軍玉昆，怕因此更激怒川人，不肯同意他遽下毒手。

可是，死罪難免，活罪難饒。所謂「五福堂」開會，不過是個藉口。實際上把他們送進總督衙署內的「來喜軒」，名為優待，飲酒賦詩，但却被軟禁起來，與外界隔絕。

蒲、羅等人被趙爾豐誘捕軟禁的消息傳出，立即引起成都羣衆的公憤，聚集了幾個人，用木板書寫光緒皇帝牌位，焚香頂禮，環跪在總督府前痛哭，要求釋放蒲、羅等人。趙爾豐不但無動於衷，反而秉持他既定方策，強硬對付；由營務處田徵葵下令巡防軍，開槍射擊。當場擊斃卅二人。（督院內廿六人，當街六人）但羣衆不怕死，仍不肯散去。田徵葵見此情形，不自檢討「民氣不可輕侮」的嚴重性；竟然一意孤行的近似瘋狂的下令開砲鎮壓。身在一旁本想調停的成都知

府于宗潼，見事態嚴重，大哭不已，立即勇衝上前，以自己身體擋住砲口，才免去一場災難。另外，巡防軍也在驅逐圍觀路人的行動中，傷及無辜多人。

次日，城外民衆紛紛進城，趕到督府，支持援救蒲殿俊、羅綸行動，田徵葵再下令巡防軍射擊，又打死數十人。於是，整個四川民怨沸騰，川西、川南數十縣先後舉事，組成民團，趕赴成都營救，與駐防軍發生戰鬥。革命黨人乘勢與「保路同志會」相結合，轉化「保路運動」為「革命行動」了。

武昌起義情勢大變

先是，自五月廿一日保路會成立時，革命黨人就開始活動。黨人朱之洪以重慶股東代表身份到成都，即與同志曹篤、方潮珍、蕭參、曾明魯、張頤、劉裕光、王殿颺、楊伯謙、劉詠閣、龍鳴劑、劉永年以及新軍中的同志密議，以為：

「爭路者日與政府言法律，辨是非，政府終不悔悟。不如激揚民氣，導以革命。然成都清吏防範革命甚嚴，黨人無兵力可恃，即發動亦無所濟。唯有各道同時發動；而成都乘時響應，庶可濟事。」

於是，朱之洪回到重慶後，即開始運動。成都的黨人也分道四出。劉聲元等一面附和保路運動，一面結合由民間組織的「同志軍」起義，頗具聲勢。

成都罷市、罷稅後，川南各縣，也紛紛響應。張培爵、楊庶堪、謝持等，即謀畫重慶獨立；

並聯絡遠近起義。

七月十五日慘案發生以後，黨人曹篤深夜縋城而出，與朱國琛等鋸數塊木板，上寫「趙爾豐先捕蒲、羅，後勦四川；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」，乘夜間分別投入江中，順流而下。這在當時通訊不便的情況下，確是一項很好的傳遞訊息的辦法。川西南各地，迅即得此木板消息，欽佩此一急智措施，稱之為：「急救水電報」。曹篤也馳往各地，秘密策動，並派劉裕先到榮縣、富順各處，密捉黨人發難。

黨人向迪璋自雙流聞此「水電報」消息，即聯合哥老會首領，出槍械，募經費，以為營救蒲、羅等人之用。不到兩天，到達雙流的「同志軍」，已超過六千人。環繞成都的八個縣，也都起來響應。向迪璋再接再厲潛赴川西南各縣敦促哥老會響應，擴大聲勢。其他各地革命黨人，也滲雜在各會黨之中，皆以「保路同志軍」的標幟；各地響應的，多則數千人，少則幾百人，皆奔赴成都。

七月十七日，「同志軍」（含「團結同志會」）先已集中紅牌樓。清防軍（此非趙爾豐訓練的巡防軍）奉令來攻，當即發生戰鬥。由於清防軍的將校姜登選、方聲濤、程潛、張次方、陳錦江等皆為革命黨人，指揮作戰時採取敷衍手段，拔去大砲信管，故意拖延時間。好讓川南黨人佔取州縣，作為根據地。一俟時機成熟，他們就可率部反正了。

為趙爾豐出死力的巡防軍在成都的只有十一個營，除了八個營負責保衛督署外，只剩下三個

營，只有官兵八百卅多人，對付聲勢龐大的「同志軍」，根本不能發生「勦辦」的作用。最令趙爾豐寒心的是一手訓練駐在雅安巡防軍周鴻勳，也是對他最忠心的驍將；居然在赴調成都的中途新津，倒戈參加了侯保爾的「同志軍」。

清廷聞知川人居然「造反」了，那還了得？一面電令趙爾豐：「對四川逆黨，務當督飭軍隊，分別勦辦」，一面於七月廿日電令尙駐留武漢的端方，帶兵入川。

趙爾豐奉到嚴加勦辦的聖旨，又得到端方即將帶兵入川的消息，更加緊他的「勦辦」戰鬥。可是七天接戰，雖然上奏「擒斬甚多」。但也不得不承認「民軍散而復合，已成燎原之勢」。

接着七月廿三日，王天杰在榮縣宣佈獨立；繼而彭山、眉山、青神、井研、仁壽、邛州、名山、洪雅、夾江、威遠等十數州縣，也紛紛響應，宣佈獨立。

清廷對此日漸嚴重的四川民變，不但不從根本上「恢復商辦鐵路」着手，反而手忙腳亂的一面令端方帶兵入川，查辦路事；一面派會經擔任過四川總督著威望的岑春煊去四川會辦勦撫事宜。

岑春煊當時正在上海養晦，俟機再出，得此廷寄，即於七月廿六日在上海發表「普告四川全省文武官員」通電，對大家應付「保路風潮」的辦法，有所責難；另並附有「告蜀中父老子弟文」，以低姿態、和緩謙抑的辭令，勸說川人稍安毋躁，靜候合理解決。

端方、岑春煊都是晚清官場的知名人物，威

望履歷，都在趙爾豐之上。一個以強硬立場來「查辦」，一個則以和事老的架勢來「會辦」。不但一國三公，使趙爾豐進退失據；而且也威脅到他的權責地位。但堂堂王命，趙爾豐又對之無可奈何。

正當趙爾豐感到苦悶之時，突然，八月十九（十月十日）武漢起義，清廷為緩和民怨，廿二日由資政院劾奏盛宣懷誤國殃民。

端方也於廿八日抵達重慶，電請釋放蒲、羅等人，替他們昭雪，並且要求懲辦趙爾豐、田徵葵等人。

事實擺在眼前，趙爾豐對川局的強硬政策，不能不加以考量了。

表面妥協心懷叵測

但是，趙爾豐很快的接到聖旨，發表「岑春煊為四川總督，趙爾豐仍回川滇邊務大道之任。岑春煊未到任前，所有川中勦撫事宜，仍着趙爾豐遵遵迭次諭旨，督飭各軍從速辦理，不得意存諉謝，致誤事機。」

岑春煊雖已獲發表為四川總督，已由上海到了漢口，但他看到自革命軍武漢起義後的民心士氣，和清廷的應付無力，知道大勢不妙；於是，不但不熱衷於入川赴任，反而悄悄的回到上海，繼續養晦去了。

走了岑春煊，只剩下一個端方，趙爾豐以為與其讓端方來成都作威作福；不如由他自己先改用妥協辦法，平息這場鬧了很久的大規模動亂。那麼，端方只好仍然回到漢口或宜昌，做鐵路大

臣。他自己就可以理正言順的復任四川總督了。九月五日，清廷下詔，將盛宣懷革職，並開釋蒲殿俊、羅綸等人，責成他們開導地方團隊，迅速解散。

於是，趙爾豐順水推舟的將蒲、羅等人由「來喜軒」請到「五福堂」，前倨後恭的轉達了：「開導地方團隊，迅速解散」的聖旨，然後送他們出署回家。

幾天後，由伍崧生老翰林領銜，重要紳士蒲殿俊、羅綸等列名的「告全川父老兄弟書」發表了，到處張貼。略云：

「蒲、羅諸先生已被禮請出署，所有各路赴援之「同志軍」應詳為開諭，勸其解散。……如能和平就撫，決不輕戮一人。至於鐵路事件，現已有正當辦法，決不為外人所有。……要求官紳一氣，開誠布公，保地方之治安，拯生民於塗炭」。

此一文告，表面上好像「保路」問題可告一段落；但實際上並不能平息川人的憤怒；尤其對趙爾豐的殘殺血債，是不會因此而善罷干休的。加以全川各州縣的民軍，受革命黨人的激勵策動，已決心起義反正，志在覆滿；情勢已與初期的保路風潮大不相同；蒲、羅等人，已無勸服之力了。而川北、重慶、川南，且相繼於農曆十月一、二、六日宣布獨立；七日，端方也在資州被殺。

成都方面，趙爾豐見到大勢所趨，全國已有十多個省份響應武昌革命，脫離清廷，宣佈反正。北京有好多天沒有電報，不知朝廷近況如何。

外人又傳出謠言：「北京失守，攝政王逃往奉天，通飭各省，自保疆土」。他知道要改朝換代了。以他的現況和實力，最好能保住權位，擔任民國的四川都督。但因為殘殺川人的血案，尚在眼前；川人決不甘願。於是他想出個以退為進，欲取先予的辦法：

「由川紳提出條件，經他認可，他交出政權，讓四川獨立自治。如此，他既不是背叛朝廷，又可示惠川人」。並且先保住巡防軍的實力，然後等待時機，再以安定地方的姿態名義，奪回大權」。

於是，由他的幕僚周善培、吳仲椿等人奔走說合；趙爾豐親自召集官紳雙方，兩次合商。紳方提出十一條件，官方提出十九條件，全部通過，規定：

「由趙爾豐出示曉諭人民，川事交『諮議局』代表蒲殿俊管理，都督印信暫交藩庫封存，擇期宣佈四川獨立，趙爾豐仍回川邊，辦理邊務。由川省負擔常年經費及兵餉銀一百廿萬兩（一說四百萬兩）。以後邊軍如需擴充，其裝備、軍械、糧餉，仍由川省協助。所有在成都的巡防軍，由趙爾豐指定八營撥交李克昌、沈少林統帶，改稱『邊軍』，不交新政府。其餘數營，交新軍第十七鎮朱慶瀾接管。趙爾豐並可暫緩赴邊，以便遇事就近諮商、指導」。

農曆十月六日，趙爾豐發表宣佈退出四川總督職位，由四川人自治的文告。

十月七日（陽曆十一月廿七日）「大漢四川獨立軍政府」在成都皇城壩宣告成立。正都督蒲

殷俊、副都督朱慶瀾。設軍政府於明代蜀藩王的王城。

陰謀敗露慘死絕命

趙爾豐利用他可以暫時留在昆明，不赴邊防的協議，仍然住在總督府；並且於交代時，從藩庫提款廿五萬兩（此事也經協議通過），作為他的軍務維持費。不但士飽馬騰，可用重賞，使將士樂於為他效命；並且還暗中號召留在打箭爐的邊防軍嵩林部潛來成都，同時又密調駐在川南的巡防軍鳳凰山部也來成都，以便裏應外合的「伺機奪權」。由於各地集中成都的「同志軍」和地方軍隊，份子複雜，良莠不齊；以致軍紀風紀蕩然。而朱慶瀾的新軍與趙爾豐的巡防軍也發生摩擦，打架鬧事。

有一位自稱是同盟會副會長的某人，在南校場公開演說，數說新成立的軍政府不倫不類，同盟會員一個人都沒有，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。博得在場觀衆多數的鼓掌。成都的一家報紙，也有：「同盟會人不平則鳴」的報導。還有過去的外省籍官員，因為改朝換代而丟掉官職；居然也組成一個：「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會」，要求軍政府賞碗飯吃。

新軍之中的外省和本省籍軍官，也有矛盾。川籍軍官竟然要求另外成立一鎮；雙方爭執也很激烈。以上種種，在老百姓看來，一切都是亂糟糟的，什麼都沒人管，好像還沒有過去的時日安逸自在。

軍政府剛成立，處此複雜紛亂的場面，當然

要設法逐一解決。最主要的是軍隊問題。蒲都督允許各軍休假十天，發給恩餉三個月；不許再騷擾地方、人民。可是，假滿後，因為財力不足，僅能發放一個月；於是軍心不服。趙爾豐乃乘機教唆巡防軍鬧事，發動兵變。推翻軍政府。

農曆十月十八日，軍政府在東校場閱兵，並向列隊的巡防軍點名，作核實發餉的依據。巡防軍即按照趙爾豐的密諭，當場譁變，向閱兵臺射擊。在場的蒲殷俊、朱慶瀾、姜登選（參謀部長）、尹昌衡（軍政部長）紛紛走避。亂兵隨即進入市區，大肆劫掠，各地來的「同志軍」和地方軍隊，也有趁火打劫的行為。整整鬧了半天一夜，火光冲天，槍聲不斷，所有公私行庫殷商，都被洗劫一空。軍政部長尹昌衡看到事態嚴重，乃即急赴鳳凰山新軍軍營，召集第六十三標標統周駿，率部入城勦捕平亂。因為蒲殷俊、朱慶瀾已走避去職，大眾乃公推尹昌衡為都督，羅綸為副都督。並即正式成立「四川軍政府」，派出川西、川北、上川南、川邊等地宣慰使，宣慰地方。趙爾豐當兵變發生後，立即仍以四川總督名義發表佈告，曉諭民衆。並要變兵到總督衙門受撫（根本否定軍政府）。奪權的陰謀，已昭然若揭。

十一月二日，軍政府又得到他密召傳嵩林和鳳山部隊來成都的情報；尹昌衡乃採斷然手段。一面派軍隊分頭阻止傳嵩林和鳳山的巡防軍，一面圍攻趙爾豐居住的總督府。參加兵變的巡防軍，因為搶劫而發了財，大家都不願再為趙爾豐個人的權利而賣命效力了，紛紛散去。使趙爾豐的實力，大為削弱。而進攻督署的新軍和「同志軍」却係為川民報怨洩憤，為解決革命障礙而奮鬥，理直氣壯。一鼓作氣的衝進了督署，活捉了正躺在床上抽鴉片烟的趙爾豐，綁送到皇城至公堂前第七塊石板前。由尹昌衡宣佈他的罪狀，在一陣如雷的「該殺、快殺」的呼聲中，被砍頭示衆。另一個殺人兇手田徵葵自知罪過深重，匆忙易服乘小舟，想從浩水偷渡，輾轉逃出川境。但被「重慶軍政府」得知，派人追捕，經過軍法審判，也被斬首示衆。「嗜砍人頭者，人亦砍其頭」，真是報應不爽；同時，陰險詭詐的、用暴力手段的、想從中僥倖得利的；也可以因此獲得教訓了。趙爾豐不以坦誠態度，面對現實，以護四川自治為幌子，再以安定地方為名，奪回政權，維護專制，不知時代潮流共和必然戰勝專制，玩火自焚，為天下唾棄。

張大千外傳

戚宜君 著

（全一冊）定價一六〇元

最低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